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指标体系研究

辛宝英

内容提要:文章在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梳理的基础之上,运用AHP方法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测评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变量进行了权重赋值。文章科学评估了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总体市民化程度,考察了不同教育结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分析了不同结构的教育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动作用。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6.98%,市民化程度还很低。教育程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也越高,而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促进最有效率的教育类型则为职业教育。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6)04-0156-10

一、引言

农业转移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股重要力量,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春超等,201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7395万人^①,占全国总人口的20.03%,占城镇常住人口的36.57%。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农业人口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和集中,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落脚在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学术界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申兵,2011)、路径(王琛,2015)、影响因素(黄锬,2014;秦立建等,2014)、成本测算(张国胜,2009)等方面展开了多学科的研究。但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必须科学评估中国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魏后凯等,2013)。问题是,应如何测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政府也没有公布具体的、系统的、可操作的、细化的标准体系。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进行了研究与测度。如王

作者简介:辛宝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管理学院工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转移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CJLJ23);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城镇化加速推进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教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ZC15076)。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2015年4月。

新桂等(2008)采用综合指标法,从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适应、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5个维度测得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总体上已达54%的水平(2006年数据)。刘传江等(2009)运用层次分析方法,选取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4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指标体系,测算出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分别为:45.53%和42.03%。周密等(2012)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和Oaxaca分解的方法预测出了沈阳、余姚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62%和81%。魏后凯等(2013)从政治参与、公共服务、经济生活、综合素质4个方面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相关指标赋权,测算出2011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综合进程只有39.56%。可见,以往学者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应如何测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缺乏一套具体的、系统的、可操作的、可供实践检验的、细化的标准体系。第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有待商榷,大部分研究采用等值赋权法,且测评维度很少涉及心理认同和文化融合等相关指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本质内涵把握不清。第三,对于市民化程度的衡量,大多数样本调查区域仅仅局限于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不能反映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情况,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足。第四,绝大多数的研究并没有对所建立的测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定量研究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梳理的基础之上,运用AHP方法从文化融合、经济地位、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等四个维度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测评指标体系。利用2014年对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抽样调查数据,科学评估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总体市民化程度,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教育结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分析不同结构的教育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二、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

构建科学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指标体系,必须建立在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内涵的明确界定之上,而本文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学术界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故做以下解释。

农民工与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是中国特殊国情“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下的产物,是那些拥有农业户口,从事非农经济活动,身份是农民但职业是工人的劳动者。2014年国务院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使“农民工”概念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用“农业转移人口”替代了“农民工”这一概念。农业转移人口是指户籍在农村,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并持续从事非农产业,依靠工资收入生活,已经实现职业转变,不具有迁入城市户籍的劳动者及其随迁家属。不包括:季节性外出打工的兼业农民,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大学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组 2014) ,但应包括:因城镇建设丧失土地转移到城镇的农业人口^①。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好办法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但市民化的真正核心并不是户籍制度,而是转移人口能否在转入地城镇安居乐业,能否获得与拥有转入地城镇户籍的居民均等的社会权利与公共服务。本文赞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4)的概念,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及其随迁家属获得与城镇户籍居民均等的社会权利与身份地位,均享城镇公共资源与社会福利,在城镇实现安居乐业,并在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完全融入城镇,成为真正市民的过程。所以说取得户籍,获得市民权利并不是市民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只有心理和文化真正融入城镇之后才算得上真正实现了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的进展程度(或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结果),可以用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衡量或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差异消减的程度来衡量。相对于农业转移人口个体时表示农业转移人口是否已经成为市民,相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时表示已经成为市民的人数或比例(即市民化率)(黄崧 2014)。微观意义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与城镇化水平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城镇化的一个阶段(市民化阶段)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王桂新等 2008)。

(二)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赋权

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和上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的综述,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代表性与简洁性、科学性与操作性、针对性与建设性及综合性与可比性要求,本文从文化融合、经济地位、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等四个维度来建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指标体系。选用层次分析法(AHP),运用Yaahp. V. 9. 1软件的群决策专家数据录入软件,获取了22位专家的实际判断数据(其中管理学家7名、经济学家5名、社会学家7名,政府相关部门人员3名),对各指标重要性程度进行赋值,并对指标体系中的各层次指标的一致性进行了检验(分别为 $CR_1 = 0.0106$ 、 $CR_2 = 0$,均符合一致性检验要求),将指标层总体权重汇总,得到各层指标权重水平。具体结果详见表1。

文化融合即农业转移人口转入城镇主流社会,对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和迁入地城镇社会区域文化的适应与接纳。对于现代工业社会文化的适应,这是所有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社会之后都要面临的,由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农业社会进入到城镇现代工业社会决定的,具有普适性。而对区域文化的适应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迁入城镇区域文化的适应,二是对原有家乡文化的保持。本文选用语言、外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作为区域文化的四个衡量维度来测评。关于现代性文化的研究,则结合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实际情况,借鉴悦中山(2011、2012)的研究,选取大众传媒、妇女地位、个人效能、计划性和对时间的评价等5个维度来测评。改编对于妇女地位的测评题项为“您对女性从政的看法是?”。

^① 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农业转移人口不应该包含因城镇建设丧失土地转移到城镇的这部分农业人口,但本文认为,失地农民尽管因丧失土地获得了城市户籍,但他们在职业上也是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所以应该属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统计范畴,我们可以称这部分人口为被动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

表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指标系统

	准则层(权)	控制层(权)	指标层(权)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	文化融合(0.0594)	地域文化(0.0119)	语言(0.002)
			外表(0.0009)
			风俗习惯(0.0058)
			饮食习惯(0.0031)
		现代文化(0.0475)	大众传媒(0.0077)
			妇女地位(0.0042)
			个人效能(0.0209)
			计划性(0.0123)
	经济地位(0.1478)	收入情况(0.013)	收入水平(0.0104)
			工资发放(0.0026)
		居住情况(0.0713)	房产情况(0.0465)
			居住环境(0.0179)
			居住条件(0.0068)
		就业情况(0.0233)	求职方式(0.014)
			每周工作天数(0.0047)
			每天工作小时数(0.0047)
		社会保障(0.0402)	劳动合同(0.0067)
			保险和公积金缴纳情况(0.0335)
	社会适应(0.2799)	社交网络(0.0933)	朋友圈(0.0311)
			与本地居民交往情况(0.0622)
		社会活动(0.1866)	业余生活安排(0.0267)
			单位活动安排(0.0533)
	心理认同(0.5129)	身份认同(0.4104)	身份观念(0.342)
留城意愿(0.0684)			
社会距离(0.1026)		城里人怎么看待农业转移人口(0.0513)	
		愿不愿意和城里人交朋友(0.0513)	

经济地位指农业转移人口在转入城镇所面临的收入、就业、居住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是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经济地位的综合反映。这四个方面构成了经济地位的具体测评指标,每个指标由多个变量或属性构成。收入情况由收入水平和工资的发放是否及时来反映;居住情况由房产、居住环境与居住条件来衡量;就业情况包括求职方式、工作时间等属性;社会保障则由劳动合同、保险及公积金缴纳情况来测评。

社会适应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在转入城镇后社会交往与社会分层的变化,即他们的人际交往对象由迁入地(老乡)群体扩展到了城镇本地居民,以及他们向中产阶级或更高层次转变之后社会活动的改变。本文用社交网络和业余时间娱乐活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适应这个指标,其中,社交网络包含朋友圈与本地居民交往这两个指标,业余时间娱乐活动的安排则由业余生活安排、单位活动安排和社区活动三个指标构成。

心理认同即农业转移人口在转入城镇社会后对自己城镇成员的身份和归属感的认同。农业转移人口转入城镇社会后需要处理两个问题:是否继续认同自己农民的身份和保持自己对农村社会的归属感;是否愿意建立起转入地社会城镇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对城镇社会的归属感。具体用身份观念和留城意愿两个指标来衡量。另外,本文也把社会距离归为心理认同的重要范畴,作为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认同的重要维度,用城里人怎么看待农业转移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愿意和城里人交朋友两个维度来衡量。本文改编 Bogardus(1925)的社会距离量表,用题项“您感觉城里人怎么看待农业转移人口?”和“您愿意和城里人交朋友么?”来测评。

三、实证检验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管理学院农业转移人口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2014年12月进行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调查。该次调查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福建、云南、四川、山西、新疆、黑龙江10个省(直辖市)进行,调查对象为16周岁到60周岁,非本地城市户籍,转移到当地从事非农工作6个月以上的城市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家属。调查包含了各地的服务性行业、建筑行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典型农业转移人口聚集行业,也包含金融、证券、保险等其他一些行业。样本具多样性、均衡性和代表性。本次调查总计获得7500个样本,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无效样本之后,得到6150个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82%。整个样本中16岁到35岁的农民工的比例超过45%,有关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2。调查问卷由农业转移人口本人及家属填写,调查范围涉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能较好地代表全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状况,用它来估算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及解释职业教育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具有代表性及推广意义。

表2: 调查样本数据描述

变量	编码	取值	样本个数	比例
性别	0	女	2030	33.01%
	1	男	4120	66.99%
年龄	1	20岁以下	241	3.92%
	2	21~30岁	1852	30.12%
	3	31~40岁	1418	23.06%
	4	41~50岁	1601	26.03%
	5	51~69岁	1038	16.87%
行业分布	1	制造业	1790	29.11%
	2	建筑业	1640	26.67%
	3	批发和零售业	500	8.31%
	4	住宿和餐饮业	1150	18.7%
	5	家政保安	350	5.69%
	6	其他	720	11.71%

续表 2

变量	编码	取值	样本个数	比例
教育程度	1	小学及以下	1090	17.72%
	2	普通初中	1900	30.89%
	3	普通高中	1150	18.70%
	4	中等职业教育	1220	19.84%
	5	高等职业教育	580	9.4%
	6	本科及以上	210	3.4%

(二)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估算

鉴于以前研究调查数据的不足, 本文运用课题组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测量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全面考察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其中, 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P = \sum_{i=1}^n w_i x_i \quad (1)$$

(1) 式中 P 表示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 x_i 表示指标层每项指标的得分值, w_i 表示指标层指标权重。准则层各分项市民化程度的计算公式为:

$$P_j = \sum_{j=1}^{jk} w_{ji} \left(\sum_{k=1}^{jkn} w_{jki} x_{jki} \right) \quad (2)$$

(2) 式中 P_j 表示第 j 分项市民化程度, w_{ji} 表示第 j 分项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w_{jki} 表示第 j 分项中第 k 个指标下的第 i 个指标权重^①, x_{jki} 表示第 j 分项中第 k 个指标下的第 i 个指标得分值。

评价结果(见图 1)表明, 2014 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 46.98%, 其中文化融合、经济地位、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 4 个方面的市民化程度分别为 53.44%、54.66%、46.31% 和 37.48%。2013 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35.9%, 按照年均提高 1.3 个百分点推算, 2014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应为 37.2%, 而按照常住人口计算, 2014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54.77%^②。可以看出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1) 从总体市民化程度来看,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46.98%) 还没有达到“半市民化”的状态, 市民化程度还很低。(2) 市民化进程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 没有城镇户籍的被统计在城镇常住人口中的农业转移人口, 绝大部分没有完全实现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的 7.79 个百分点为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城镇常住农业转移人口。(3) 从不同维度考察, 水平差异较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经济地位的市民化水平最高, 总体上已达到 54.66%; 其次是文化适应(53.44%) 和社会接纳(46.31%), 心理认同的市民化水平最低, 仅为 37.48%。这说明经济地位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生存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 其市民化程度已超过农业转

^① 限于篇幅本文只报告了每个指标层相对目标层的具体权重(见表 1), 没有报告每个指标层相对上级指标的权重, 如有读者需要, 可联系作者。

^② 数据来源于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水平。而心理认同这一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本质内涵的高层次维度指标,其市民化水平最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本质上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因此,全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必须均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文化融合、经济地位、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上的市民化水平,而心理认同应该是今后政府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方面的重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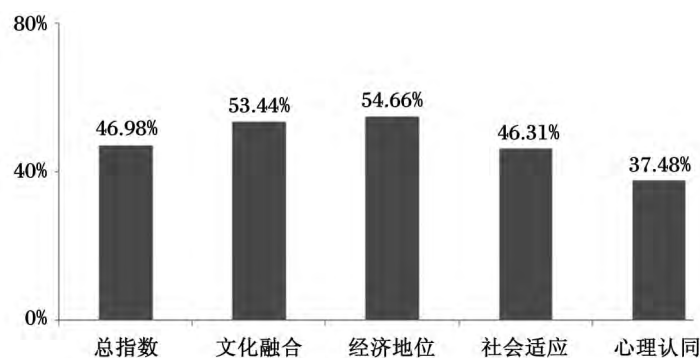


图 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

(三) 教育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改革对教育结构所决定的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对劳动力的职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这就需要通过改革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综合素质、市民化能力等要素升级。已有研究(谢桂华,2012;沈映春等,2013;刘万霞,2013;刘松林等,2014)表明,教育因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素质,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进而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但对于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是否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学术界还没有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教育类型和不同教育层次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分析不同的教育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动作用。

为考察不同教育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我们将所有样本设置为6个等级:小学及以下、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技校、中专、职业高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职)和本科及以上。采用上文指标体系及课题组调研数据对不同教育结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进行综合测评,研究结果显示(见表3):(1)在教育层次上,教育程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程度也越高。这是因为教育层次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文化适应能力和经济获得能力就越强,且更易于被城市社会所接受,留城意愿及融入城市的意愿也更强烈,市民化程度就越高。(2)在教育类别上,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更能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上效率最好的教育类型为职业教育。普通高中组和中等职业教育组的学历层次和受教育年限一致,但中职教育组的总体市民化程度(54%),远高于普通高中组(37.68%),且中职教育在经济地位、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上的市民化程度均

高于普通高中组,这说明职业教育因为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就业能力,促进了其经济地位,并通过影响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的社会适应与心理认同直接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继续比较本科和高职教育,我们也发现尽管本科组的市民化总体水平及在文化融合、经济地位、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上的市民化水平均略高于高职教育,而高职教育的受教育年限是三年,本科教育则是四年,并且农业转移人口一般通过普通高考来接受本科教育的途径并不是很容易,且通过自学考试或者成人高考来获得本科教育也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备考。所以说从投入产出上来看,高职教育比本科教育更经济有效。这就进而说明了职业教育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上效率最好。

表 3: 不同教育层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评价

类型	小学及以下	普通初中	普通高中	中职教育	高职教育	本科及以上
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	17.03	27.77	37.68	54.00	70.15	76.49
文化融合(%)	23.58	38.44	57.41	54.65	61.22	72.73
经济地位(%)	26.42	40.56	49.85	60.03	74.75	82.73
社会适应(%)	16.20	27.29	42.23	51.19	67.67	73.87
心理认同(%)	15.78	21.37	29.42	53.73	71.21	76.56

四、结论与建议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本文所构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指标体系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结果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相符的。由此可见,本文所构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测评指标体系能较客观真实地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状况,这对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衡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体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6.98%,可见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半市民化”的状态,市民化程度还很低。不同维度考察结果显示,心理认同这一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本质内涵的高层次维度,市民化水平仅为37.48%,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本质上提高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同时通过考察不同教育层次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发现教育程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也越高,而在教育类别上,职业教育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促进最有效率。

因此,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继续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的深化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推进有意愿、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转入地落户定居,制定差别化的落户条件,分类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点解决举家迁移、长期(5年以上)城市就业、在城镇拥有自购住房以及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落户问题,因为这部分人的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均高于其他

农业转移人口。消除城乡之别,逐步破除相关的制度壁垒,对于那些不愿意转移户口及不符合落户条件的城镇常住农业转移人口,推行居住证制度,“阶梯式”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辜胜阻等 2014)。一蹴而就的对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不现实的,采取“阶梯式”的方式,既可以缓解政府财政负担,又可以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原则。对于那些影响资本积累和一生发展的权益,比如教育、公共卫生等要优先给予。对于那些不会给当地财政带来负担的权益,比如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等要保证给予。对于那些财政补贴缴费的权益,应设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最低给予标准。而对于保障性住房等福利待遇则要增加政府补贴,出台农业转移人口买房优惠政策,从而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楼市去库存的双赢。

第二 积极探索农民就地城镇化道路,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一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支持农民以自营或者出租的方式使用自有产业集体建设用地参与城镇建设(潘家华等 2013)。二是积极做好土地征用补偿、拆迁安置住房及被征地农民的住房、就业、医疗、保险、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工作,推进“城中村”农民与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魏后凯等 2013)。三是加大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就地实现市民化。

第三 政府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时,不仅要继续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收入、住房改善,而且更要关注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认同、社会适应等非物质层面。发挥社区作用,通过组织各类社区活动,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交往平台,增进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彼此认同。

第四 保障农业转移人口教育的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和劳动技能,进而使他们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改善他们实现市民化的能力。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术教育。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结构能够适应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新要求。另外,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职业培训,必须强调内容的针对性、层次性和个性化;培训时间的灵活性和参与可行性;培训信息要广而告知,提高知晓度;最关键的还要注意费用的减免性,从而调动参与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辜胜阻、李睿、曹誉波 2014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二维路径选择——以户籍改革为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4, 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4 《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黄崧 2014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与制度创新”,《经济研究参考》2014, 8。

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 2009 《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刘松林、黄世为 2014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统计与决策》2014, 13。

刘万霞 2013 “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基于对全国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3, 5。

潘家华、魏后凯 2013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 6——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秦立建、陈波 2014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管理世界》2014,10。
- 申兵 2011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难点及对策”,《中国软科学》2011,2。
- 沈映春、王泽强、焦婕等 2013 “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3,5。
- 王琛 2015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解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3。
- 王春超、何意奎 2014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4。
- 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 2008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人口与发展》,2008,1。
- 魏后凯、苏红键 2013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3,5。
- 谢桂华 2012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4。
- 悦中山 2011 “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 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 悦中山、杜海峰、李树茁、费尔德曼 2012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2,1。
- 张国胜 2009 “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 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中国软科学》2009,4。
- 周密、张广胜、黄利 201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农业技术经济》2012,1。
- Bogardus E. S. ,1925a. “Social Distance and Its Origin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9: 216 – 26.
- 1925b. “Measuring Social Distan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9: 299 – 308.
- G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 Religion ,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Granting Urban Residency to Rural Migrants

Xin Baoying^{1,2}

(1.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 Shandong Management University ,Jina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granting of urban residency to urban migrants , and then uses the AHP method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granting urban residency to rural migrants and assigns weights to each indicator variables. The paper uses data to estimate the degree of the granting of urban residency to rural migrants , examines the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of these migrants , and analyzes how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promote the granting of urban residency to rural migrants. We find that the degree of the granting of urban residency to rural migrants was still low in 2014 , standing at 46.98% . Educational level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is development: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al level , the greater the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urban residency ,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made the most contribution to that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paper offers policy suggestions on granting urban residency to rural migrants.

Key words: Rural Migrants; Obtaining Urban Residen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责任编辑: 武昭含)